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13

浅层融入与跨国钟摆： 老挝的湘籍农村人口“流而不迁”现象研究

张恩迅

(湘潭大学 社会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1989年以来持续迁徙至老挝经商、务工的湘籍农村人口,普遍呈现“跨国钟摆”的迁徙规律和“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文化适应特征。以往基于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南北流动”移民研究而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很难摆脱将移民固化在输入地单一端点内讨论带来的理论局限。湘籍农村人口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南南流动”并形成持续性跨国网络,他们“流而不迁”的深层原因是祖籍国的源头市场支撑、乡土社会关系运作以及输出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影响等。

关键词:文化适应;跨国钟摆;南南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92-09

一 问题的提出

1989年,中国与老挝的外交关系恢复后,湖南人便不断迁徙至老挝经商、务工并持续至今。2008年,老挝的湖南商会在老挝首都万象成立,成为湖南省首个境外商会。2017年,老挝在长沙设立总领馆,成为外国政府在湖南省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侧面反映出湖南人在老挝的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的湖南人已达十余万人,他们主要涉及摩托、手机、农机、家电、建材五金、百货服装、农业养殖、宾馆餐饮、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在老挝的湖南人主要来自湘中农村地区,截至2017年,老挝湖南商会注册会员3682人,其中邵东农村户籍会员2946人,其余会员也主要来自祁东、祁阳等湘中县的农村地区^①,他们广泛分布在老挝各省、县、村中。

文化适应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移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城

市化发展,大量农村移民、国际移民涌入城市,以帕克(R.E.Park)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针对移民社区、社会融入等问题,提出了文化同化论、文化休克论、多元文化论等一系列理论。而在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中国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农村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被打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甚至欧美发达国家,随后学界开始了农民工研究^②、国际移民研究^③等。那么,无论是身处“二元社区”的城市农民工,还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国新移民,他们如何融入输入地主流社会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自1989年以来,湘籍农村人口持续迁徙至老挝经商、务工,他们在工作企业或中介公司拿到劳动就业证和暂住证后,普遍持有一年一签、可多次

收稿日期:2020-1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CSH019);中国侨联项目(19CZQK221);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YBQ100)

作者简介:张恩迅(1985—),男,湖南湘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移民与族群研究。

①数据来源:老挝湖南商会。

②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往返的劳务工作签证。每年清明、春节等重要节日或国内亲友婚丧嫁娶,是他们回国返乡共同的时间节点。不同于从“沿边”“沿海”等传统侨乡流向国外的华人移民,来自内陆农村的湖南人定期跨国往返于中国与老挝之间并构建了持续性的跨国网络,其迁徙规律更像是“每年春节前后在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像永恒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的农民工群体”^①。虽然第一代湘籍农村人口已持续跨国迁徙30余年,但他们仍会选择回国养老。即便很多在老挝累计居留时间已超过10年且符合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湖南人,也会普遍持中国护照定期像“跨国钟摆”一样往返于中国与老挝之间,他们在老挝社会普遍呈现“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文化适应特征^②。

目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多强调处于边缘地位的移民在与输入地社会主流文化的长期接触中,逐渐被同化甚至放弃其原有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这与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的移民文化适应特征有较明显的差异。例如,周大鸣等人指出广州的韩国人在适度“浅层融入”表象下,是以维系“深度区隔”为核心的文化适应策略^③。牛冬则用“过客”(transient)一词概括了非洲人在广州的暂时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群体特征^④。陈凤兰发现,南非的中国新移民在基本价值、家庭观念、消费观念等方面与南非人有明显的文化冲突,中国人对南非文化总是“保持距离”^⑤。黎相宜等人则论述了东莞移民在牙买加的跨国实践,是“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社会境遇的一种弹性选择等^⑥。

综上,虽然以往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流动”移民的文化适应特性及其原因做了深入分析,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但以往针对“南南流动”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大多仍未摆脱“输出地移民——输入地社会”互动

关系的传统同化论分析框架,即将移民固化在输入地单个端点内讨论,而容易忽略移民的输出地社会以及移民在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构建跨国网络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对老挝湘籍农村人口“流而不迁”现象的关注,重点从湖南人的输出地社会以及跨国网络的运作,探讨他们“浅层融入,深度区隔”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 湘中农村的集贸经济与行商传统

老挝的湖南人中以邵东人、祁东人数量最多。邵、祁两县地处湘中腹地且南北相邻,不沿边不沿海,同属衡邵干旱走廊,自古灾害频发,人均耕地少,人口密度大,如2015年祁东人口密度536人/km²,邵东人口密度522人/km²,远超省均342人/km²;祁东人均耕地0.57亩/人,邵东人均耕地0.61亩/人,远低于省均0.9亩/人^⑦。清代以降,邵、祁两县农民便迫于生计压力,常利用农闲时四处卖货或替人做手艺来补贴家用,如《道光·永州府志》卷七载:“祁东田少而户多,其民率挟货而走四方,从事于贸迁者居半。”《光绪·邵阳县志》卷一载:“邵阳东乡多冶及攻木之工”,邵东火厂坪农民在清代便多以打铁为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千家驹等人曾对广西桂林百户纺织作坊做过调查后发现,当地织工全部来自湖南邵东、祁东等地^⑧。

(一) 以技促商的集贸经济

邵东全县二山一水二分田,丘陵山地占五分。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农民或受雇当长工、佃耕,或肩挑贩运维持生计,每遇天灾,惟沿门乞讨和流离失所。县境内煤矿较丰富,据《乾隆·宝庆府志》载:“邵阳以煤开采为最先,而分铁煤、柴煤,东乡(今邵东)产之特多。”^⑨因此当地民众在清代便有了采矿冶金的传统,如“火厂坪镇”便因户户打铁而得名。邵东产的铁铸锅鼎、犁头、刀斧等手工制

①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②周大鸣,张恩迅:《湖南人在老挝的迁移与适应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④牛冬:《“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⑥黎相宜,陈送贤:《浅层融入、深度区隔与多层跨国实践——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⑦数据来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2016》以及两县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所得。

⑧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0-121页。

⑨邵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邵东文史第4辑》,湖南地质矿产局物探印刷厂1992版,第25页。

品经邵水、蒸水销往外地。民国时期,境内民众在务农基础上兼事铁、木、篾、砌、锯、棕、陶、造纸和制笔墨等手工业,手工作坊遍及境内集镇,亦有人靠挑脚、抬轿、拉板车、驾船、贩卖等度日,乞讨者常见^①。

1978年,国家允许城镇待业青年自筹资金开办企业后,邵东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如1982年火厂坪镇27个村发挥传统手工业的优势,从事用废铁生产钢球、铁制农具等家庭工副业,年产钢球1万余吨,产值800多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邵东一些规模较大的露天墟场被改建为厂棚式固定摊位,农村集市逐渐发展为辐射全国的专业批发、零售市场,如东有余田桥、水东江的农副产品集散市场;西有毛家栗山的五金市场,产品远销贵州、云南等省;北有廉桥药材市场,跻身全国十大药市之一;县城两市镇小工业品批发市场的规模当时为中部各省之首。至1990年,邵东县商品零售总额5.63亿元,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2.55亿元,列湖南省各县之首^②。

(二) 湘中农村的行商传统

清代以降,祁、邵等地湘籍农村人口便形成了向邻近的、经济落后的西南地区迁移的传统,其迁徙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缺地农民的迁移。清代管辖西南的政府多鼓励外地人垦荒,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在雍正初年向进川、黔、桂的外地人提供“牛具、种籽,令其开垦荒地”^③;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在雍正年间招募汉人入滇垦荒,每户给田20亩,借给籽种、耕牛和路费,“其田给予执照,永远为业”^④,吸引了很多缺田少地的湖南人跨省迁徙。

二是流动商贩的迁移。清代西南各地广泛分布着湘籍商贩,如云南“滇本夷地,并无汉人,然至今城市中皆汉人。至于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楚南、江西两省之人”^⑤,贵

州“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为多”^⑥。有学者认为,湘籍商贩在清代进入西南可能与当时的盐法改革有关^⑦,因为宝庆(下辖邵东)、永州(下辖祁东)等府长期食用两广质优价廉的粤盐,市场需求极大,这便吸引了很多湘籍商贩在广西等地从事跨省的粤盐运销。

三是手工艺人的迁移。西南地区手工业基础素来薄弱,给湘中农村擅长做手艺的贫苦农民提供了机会,西南各地便成为湘中农民的首选去处,如广西全州“土氓朴拙,不习技巧,业六工者十九江右、湖南客民……工惟泥水匠颇多,陶工、缝工,土著间亦有之,至木工、石工、冶工,则土著几无人,作室制器,必籍来自永(永州)、宝(宝庆)等处之流寓者”^⑧,恭城“城镇街乡开铁匠者多是湖南人”^⑨,贺县“冶工、石工多湖南人,本境很少”以及柳州陈家码头、东泉街“十有八九织布,均由湖南人经营”^⑩。

总之,改革开放后,在传统的集贸经济以及行商传统的影响下,湘中农村依托邵东等地快速发展的集贸市场、家庭作坊以及大量外流的湘中农村人口,逐渐探索出了一条解决湘中农村经济困境的发展路径,“市场+作坊+商贩”的经济运作模式得以形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量外流的湘中农村商贩已遍及云南、广西、贵州等西南各省,1989年中老外交关系恢复,使得当时聚集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湖南人看到了老挝商品匮乏的商机,大量湖南人开始从云南边境迁徙至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老挝的早期经营模式基本“复制”了清代湘中农村货郎、手艺人走村串户、挑货摆摊、流动经营的行商传统,这种极具流动性且适应性强的经营方式在当时信息不通、交通不畅、商品奇缺的老挝取得了奇效,很多湖南人因此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这也为后期湘中农村人

①邵东县志编纂委员会:《邵东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②邵东县志编纂委员会:《邵东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42页。

③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④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⑤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⑥爱必达:《黔南识略》,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5页。

⑦何林夏,范玉春:《湖南移民徙居桂东北的历史考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⑧吕余生:《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⑨陈炜:《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61页。

⑩陈炜:《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

口大量迁徙老挝奠定了基础。

三 跨国网络中的市场、关系与国家

从第一批湖南人迁徙到老挝至今已有30余年,他们围绕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搭建的跨国网络从未间断,他们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的同时,又与湖南家乡保持着频繁的跨国联系,定期进行着“跨国钟摆”式的往返迁徙,如中国传统节日或家乡亲友婚丧嫁娶时,从老挝至中国的航班、国际大巴上挤满了回国的湖南人。虽然很多湖南人已在老挝累计居留多年,但他们普遍未产生“扎根”或“安家”的强烈意愿,即便身处老挝也普遍说家乡话、吃家乡菜、过家乡节、拜家乡神等,呈现“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文化适应特征^①。针对老挝湘籍农村人口“流而不迁”的移民现象,很难用传统同化论的分析框架加以解释,而是应把湖南移民的这种特征从单一输入地社会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跨国迁徙背后的输出地社会以及跨国网络的重要影响。

(一) 跨国网络中的源头市场

湘中农村小商品市场是湖南人搭建中国—老挝跨国市场网络的源头渠道之一,湖南人在老挝城乡销售的基本是中国商品,其供货渠道无须依赖输入国老挝或其他国家,这也决定了湖南人在老挝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湖南人自1989年至今的两次大规模迁徙老挝,均与邵东集贸市场的发展历程十分契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邵东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加上老挝交通落后且商品奇缺,第一批迁徙老挝的湖南人仅靠“人力贩货”就把中国商品顺利卖到老挝各地。2000年以后,湘中农村受到国内小商品市场激烈竞争的冲击,其中低端商品囤积、产能过剩的问题凸显,而刚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老挝再次出现商品奇缺的市场需求,为湖南人第二次大规模迁徙老挝提供了经济动力。

回顾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虽然“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早已广为人知,但地处湘中腹地的邵东集贸经济早在1978年便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全国推广。1978年6月13日,《湖南

日报》大幅刊登《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湖南邵东县集市贸易调查》一文,提出“邵东农村集市贸易有效补充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不足,活跃了农村经济,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等核心观点。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也明确提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等经济建设方针,一举奠定了此后湘中农村经济的发展轨迹。

回顾邵东集贸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地摊市场阶段,两市塘在1952年以摆地摊的方式举行首届物资交流会,1956年该县集贸市场扩大至28处,1966年变成41处,“文革”期间集贸经济一度停滞,直至1978年《人民日报》对邵东经验做出肯定后,其集贸市场才恢复发展。二是门店市场阶段,1983年该县新建34个市场,拥有场地5.6万平方米,至1996年全县运行的大小市场78处,室内摊位19988个。三是专业市场阶段,2000年初各类市场遍布全县,经商门店15000多间。以邵东工业品市场为中心,中南五金大市场、邵东家电城、邵东建材城、邵东农林城、中南皮件城、邵东服装城等10多个专业市场格局形成。四是现代市场雏形阶段,2005年,邵东工业品市场参照浙江义乌建设“国际商贸城”,建设面积63000平方米,新建高档门面1800多间,全县建有26个专业批发市场和58个乡镇农贸市场,集贸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见表1)^②。

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湘中农村资源贫乏、人多地少,发展工业不太可能围绕当地资源转,只能紧紧围绕市场转,邵东县围绕集贸市场来推动地方经济的经验也被称为“邵东模式”,即将市场摆在城镇化发展的首位,形成以各类专业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为主体的乡村经济产业链,如眼镜、箱包、火机等产业。然而,2000年后,在与广州、义乌、温州等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邵东的集贸经济遭受较大冲击,因为湘中农村“先天性”资金与技术的匮乏,许多乡镇企业、家庭作坊盲目模仿品牌商品且质量较差,“邵东货”一度在国内消费市场中饱受诟病,湘中农村生产的廉价、中低端商品

^①周大鸣,张恩迅:《湖南人在老挝的迁移与适应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②数据来源:邵东县商务局。

只能依靠大量外流的当地农村人口销往经济更落后的边远农村和欠发达国家。

表1 邵东发展较早的老市场

市场名称	市场位置	成型时间	经营范围
两市镇小商品批发市场	邵东县城中心	1981年发展,1983年扩建	小商品
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	邵东县西南	1944年始建,1988年新建	小五金
邵东火车站布袋市场	邵东县城北部	1979年形成,1985年新建	箱包皮具
太阳眼镜市场	邵东县廉桥镇太阳村	1981年形成	眼镜
廉桥药材市场	邵东县廉桥镇	1983年发展	药材
徐家铺木材市场	邵东县北部	1984年新建	木材家具
洪桥集贸市场	邵东县西北部	1834年成墟,1984年新建	仔猪、耕牛、粮食
火厂坪集贸市场	邵东县东部	1976年新建	钢铁制品
崇山铺综合市场	邵东县东北部	1983年新建	黄花菜、棉纱

总之,湘中农村的“市场”并不局限于各县镇的小商品市场,而是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网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温州市场“不仅包括在各镇上街巷里看得见的数以万计的店面或摊子,而且还包括撒在全国各地十多万每天在火车、轮船上运转,甚至深入到偏僻边区活动的商贩大军;各家各户的生产者就是靠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和摊贩,甚至同无数消费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而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①。事实上,邵东市场与早期的温州市场极为相似,湘中农村经济也正是依托“小商品市场+家庭作坊+流动商贩”的模式而不断发展并扩张至老挝等发展中国家的。

(二) 跨国网络中的熟人关系

湘中农村市场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其市场的扩张与发展必须要与湘中农村的乡土社会关系紧密绑定在一起,因为当地生产、销售的中低端商品很容易受到国内其他商品市场以及城市消费者的排斥,再加上1989年跨国迁徙的湖南人早已在老挝各省、县、村搭建了不同层级的商品销售网络,他们需要依靠大量“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来支撑这套跨国市场体系的运作,这便突显了湘中农村熟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湘籍农村人口大多都是以“亲帮亲”“邻带邻”的熟人介绍方式流向老挝的,他们在老挝也自发聚集成一个个“邵东街”“湖南城”等。老挝的湖南人只有经营好了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才有可能保障其跨国市场网络的高效运转。

1. 湖南人的聚居区

目前,老挝首都万象主要有三个湖南人的经济聚居区,第一个是1999年建成的“老中友谊商品城”,俗称“老中国城”;第二个是2007年建成的“老挝三江国际商贸城”,俗称“新中国城”;第三个是依托“老中友谊商品城”而自发形成的湖南商业街,俗称“邵东街”。三个聚居区各自相距约2至3公里,呈“三角形”分布。新中国城的规模最大,共有商户800余家,其中600多家为中国商户,包括湖南商户400余家。老中国城的商户约200多家,其中湖南商户100多家。邵东街约60多家商户,以邵东籍经营者为主^②。

湖南人聚居区具备了一个中国现代社区的所有要素,市场及周边区域均拥有较完善的社区功能,如中国式的租赁公寓、劳务中介、酒店餐馆、外汇钱庄、健身场馆、教育机构、医疗诊所、超市商场、地下赌场等各类场所一应俱全,聚居区能满足湖南人所有的生活、娱乐和经营需求,聚居区内即便不会说老挝话也能长期生活,身处聚居区的湖南人就像生活在国内的城市社区中一样舒服自在,其完善的社区功能也进一步限制了聚居其中的湖南人产生主动融入老挝社会的意愿。

在聚居区中长期生活、经营和务工的湖南人,普遍没有强烈融入老挝主流社会来获得输入地社会认可的主观诉求,他们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是在老挝的赚钱能力,当早期迁徙老挝的湖南人通过前期资本积累,在湘中农村社会中被口口相传

^①费孝通:《温州行(中)》,《瞭望周刊》1986年第21期。

^②数据来源:新、老中国城数据由市场管理方提供,邵东街数据为笔者2017年田野调查统计所得。

为“成功人士”后,就很容易借助熟人关系吸引大量亲戚、老乡、朋友等追随而来,这些湖南人也正是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湘中农村劳动力和搭建新的熟人关系网络,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老挝的市场竞争力,并成为兼具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源头人物”,而湖南人聚居区恰好也为他们大量吸收湖南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缓冲平台。

2. 跨国流动的礼物

中国人历来重视礼物往来,以个体为中心的、流动的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特别是在改造、维系、再生产人际关系等方面,互惠交换和礼物馈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礼物交换也是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交换方式,属于市场商品体系的一部分^①。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的湖南人并不会因为远离家乡而淡化中国式的人情往来,他们反倒更重视借助礼物的流动来维系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的运作。老挝的湖南人日常礼物往来的方式主要分两种:一是“点对点”的私人送礼,如血亲、姻亲、熟人等在传统节日、人生礼仪中的礼物往来;二是“点对点”的公共随礼,如通过礼物、礼金等来保持基本的社会关系稳定。

以在老挝经营手机店的宁兵(化名)夫妻为例,他们认为与亲友搞好关系是在国外经营好生意的基本前提,因为绝大多数湖南人都是靠血缘、地缘关系迁徙老挝的,夫妻俩在国内的小孩教育、父母赡养、家庭琐事、资金周转、进货渠道等,都需要依靠国内亲朋好友的照应和帮忙,而礼物的跨国流动恰是他们用来维系社会关系的实用策略之一。2017年1月15日,距离中国小年还有一周时间,宁兵夫妻早已备好两份拜年的礼物清单:一份是送在老挝的亲友,每人一箱加多宝、一箱椰岛鹿龟酒和一条芙蓉王烟;一份是夫妻回国后送湖南的亲友,每人一盒老挝古树茶、一包野生红菇和一罐野生灵芝粉。

夫妻俩准备的两份礼物经济价值相似,价格约300元至500元,不同的是他们给在国内的亲友送的是老挝特产,而给在老挝的亲友送的是中国商品。夫妻俩即便平时遇到国内亲友婚丧嫁娶

或重要节日无法回国时,也会委托生活在国内的父母代为送上礼品或礼金。我们从其家庭送礼清单中也可以看出,宁兵夫妻在礼物流动中同时扮演着送礼人、收礼人、代礼人等多重角色,其家庭礼物的跨国流动轨迹也随之呈现出来(见表2)。

表2 宁兵夫妻2017年1~8月送礼清单

夫妻与收礼人的关系	收礼人所 在国家	送礼 理由	送礼价 值(元)
父母	老挝	拜年	300
表舅	老挝	拜年	300
岳父岳母	中国	拜年	500
哥哥嫂子	中国	拜年	500
上级经销商	老挝	拜年	500
借钱的朋友	中国	拜年	300
堂弟	中国	结婚	200
兄嫂的父亲	中国	葬礼	300
姑表兄	中国	结婚	200
村里好友的女儿	中国	满月酒	300
姨父	中国	建新房	200
老乡1	老挝	店铺翻新	200
老乡2	中国	做寿	200
朋友	中国	满月酒	300

3. 跨国相亲的流行

早期下南洋的华人中女性稀少,一些男性华人便会与当地妇女通婚,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土著妇女也就成了文化涵化的中介(agents of acculturation),通婚成为增强涵化的决定性因素^②。中国人与老挝人的通婚案例,主要集中在邻近老挝且语言、习俗、信仰相似的云南省,以中国男性与老挝女性的通婚最常见。虽然湖南人迁徙老挝的历史已达30余年,但他们与老挝人之间并未出现普遍的通婚现象,湖南人对“湘老通婚”普遍持谨慎态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文化观念上认为老挝人“太懒”,二是从经济考量上认为结婚成本“太贵”。

一方面,由于老挝自然资源丰富且人少地多,老挝人很容易从周边环境获取日常所需的各种食材,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老挝人就普遍形成了“顺其自然”的生活习惯和劳作方式,常抱着“干一顿,吃一顿”的乐

^①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②郝时远:《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观态度^①,而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湘中农村迁徙出来的湖南人,就非常难以理解老挝人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态度,进而导致“湘老通婚”的困难。另一方面,老挝的非法跨国婚姻越来越多,出现很多中国男性来老挝“买老婆”的违法行为,老挝各级政府进一步提升了中老通婚的审批门槛,跨国通婚不仅需要通过老挝的村、县、省各级政府近一年审批流程,还要花费近万元的手续费,这也让很多在老挝省吃俭用的湖南人难以接受。又一方面,老挝普通家庭的人口数量较多且普遍贫困,迁徙至老挝谋生的湖南人也大多不愿承担因为中老通婚而产生的额外家庭负担。

目前,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且已达到适婚年龄的湖南男性青年,主要还是在家乡物色对象组建家庭,一般是由父母或亲友帮忙联系媒人,再由媒人在湖南的乡村物色好婚配对象,将两人的家庭情况、个人信息、婚配条件等进行综合匹配,经过男女双方家长初步认可后,相亲者之间便通过微信、QQ等互联网工具进行跨国交流。男女双方感到彼此满意后,在老挝的男方一般会抽两至三个月时间专程回国与女方继续相处,彼此最终满意后再由双方家长沟通订婚和结婚的细节并最终在国内完婚。这种跨国相亲的操作基本遵循湘中农村“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的传统婚配流程,且男女双方的家庭住址一般相距不远,相亲双方基本是本村或本乡人,均较熟悉彼此的家庭基本情况。双方结婚后,在国内的女方一般都会追随丈夫到老挝经商或务工,所以在老挝的湖南人以夫妻店、夫妻厂、夫妻工的样态最为常见。

4. 湖南留守儿童与老人

目前老挝整体的教育水平较落后,华文学校教学内容较陈旧,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学校只有小学课程且与国内教材不同步,教学对象也主要是服务老挝籍的华人子弟和老挝儿童。湖南人普遍认为老挝的教育水平难以满足其子女的教育要求,因此大多不愿将子女接至老挝学习。湖南人在老挝经商、务工期间,普遍将子女留在湖南农村接受教育,子女的日常生活和监护则多交由夫妻双方的父母或邻近亲戚代为照管。子女“在湘

教育”也成为湖南人与家乡社会建立跨国纽带的重要途径之一,湖南人普遍将子女教育视作其事业之外的重要投资,他们在老挝赚的钱很大程度又以“教育资本”的方式流回了湖南农村^②。

除了留守儿童外,湘中农村还有数量众多的留守老人,少数村庄甚至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而成了“空心村”。这些留守在家的老人,既要承担日常的农业生产、家庭劳动和人情往来,还要承担抚养、教育孙辈的任务,因此在老挝经商、务工的湖南人在老人赡养上,多以跨国汇款、建楼添器等方式进行经济和物质供养。如在老挝的湖南人除支付基本家庭开支、农业生产、老人医疗等费用外,还热衷于回湖南家乡修建新楼房、购置新家电、新家具等,在物质上对留守的父子女进行补偿,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小孩教育、老人赡养的问题。留守子女长期缺乏父母教育和监管,辍学现象较常见,由于缺乏技能和知识储备,通常只能前往老挝来投靠亲友谋生,形成湘中农村跨国劳动力的代际传递。

(三) 跨国网络中的国家认同

1994年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正式开通,开始允许前期以跨境偷渡为主的湖南人办理正规合法的劳务签证入境老挝,老挝的孟塞、琅勃拉邦、万象、他曲、沙湾拿吉、巴色等城市也逐渐放松了对中国商贩的经营管制,持合法护照入境的湖南人开始从过去的流动摆摊转向定点经营。依托湘中集贸市场的优势,来自邵东、邵阳等地的湖南人纷纷进入老挝各地开店抢占消费市场。还有长期在西双版纳农场工作、生活的祁东、祁阳等地的湖南人,也开始大量进入老挝开店经商,老挝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湖南人迁移高潮。

然而好景不长,1994至1997年大量进入老挝各地定点经营的湖南人,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集体经济的重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先在当时老挝最大贸易合作伙伴泰国爆发,老挝经济遭受重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老挝币基普严重贬值。据统计,1993至1996年人民币兑老挝币的汇率分别为1:70、1:90、1:110、1:130,但到1997年9月,人民币兑老币的汇率已提升到

^①张恩迅:《老挝乡村贫困的省思——以琅勃拉邦省南巴县N村为例》,《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②张恩迅,申玲玲:《中国新移民跨国实践的特征研究——以老挝的湖南人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1:160,到1998年3月,人民币兑老币的汇率变为1:300^①,到2017年,1200元老币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老币汇率一直较稳定,老挝的湖南人并没有把老币及时兑换成人民币的习惯,他们多将辛苦赚的钱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保险柜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湖南人只能尽快将老币兑换成人民币或美元保值,但那时市场上已无人再愿接收老币了。老币的大幅贬值直接导致了湖南人资产的急剧缩水以及老挝民众消费力的急剧下降,1997至1998年,大量湖南人因为资产贬值的压力或是面临破产的境地回迁中国,一部分人留在云南继续谋生,另一部分人则回到湖南再就业。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亚洲各国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唯独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经济上保持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人民币价值不降反升^②。中国经济的平稳态势客观上为从老挝撤回国内的湖南人提供了缓冲的机会,避免了湖南人资产进一步缩水,也为撤回国内的湖南人再就业及谋生提供了国家层面的经济保障。正是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老挝湖南人的国家认同有了较显著的提升。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再次迁徙老挝的湖南人普遍形成了及时将老币兑换成人民币的经营习惯,他们在遭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时,也会第一时间选择集体回国避险。事实上,湖南人数次回迁中国的背后,客观反映了中国实力崛起与移民国家认同提升之间的紧密关联。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早已投入到为老挝湖南人服务的政府工作中,广泛涉及签证、航班、培训、减税、安保、劳务保障等一系列便民政策。湖南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湘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早已离不开寓居在老挝和全球各地的湖南人,他们常年的跨境汇款不仅保障了湘中地区数以万计农村家庭的正常运转,湖南省更是可以依托他们构建的跨国网络,将全省的商品、

工业设备、剩余劳动力、文化和技术“输出去”。因此,不同于早已加入老挝国籍并融入老挝主流社会的老一代华侨华人,老挝的湖南人自始至终都见证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湘中农村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湖南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成千上万在老挝经商、务工的湘籍农村人口,这些散居在老挝和全球各地的湖南人更是离不开中国制造市场和湘中商品市场的跨国支持,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制造业和廉价的中国商品供应链做后盾,湖南人长期依赖的跨国市场网络将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他们基于跨国市场搭建的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了^③。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根据美国24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那些最有条件过跨国生活的知识精英和跨国移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国籍。事实上,很多美国移民早已实现了“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这种状况构成了对美国认同的挑战。亨廷顿认为,无论是跨国移民还是离散族群,他们频繁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产生了对美国认同的消解^④。不可否认,亨廷顿等人提出移民频繁的跨国流动会使得民族国家边界逐渐淡化的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但难以对定期往返于中老两国之间的湖南人“流而不迁”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老挝湘籍农村人口持续性的跨国往返流动,离不开中国制造市场、湘中农村社会关系运作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频繁的跨国流动也并未减弱湖南人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他们即便常年身处老挝经商和务工,也热衷于在互联网上发表爱国言论,定期观看中国阅兵或春节联欢晚会,少数湖南人甚至还建立了在老挝的流动党支部,并积极跨国参与湖南农村的政治选举等。虽然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会根据老挝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做出调适,如工资日结、口头赊账、二手商品租售等,但他们在老挝仍保留了湖南的节庆习俗、饮食习惯、民间信仰等传统,普遍呈现

①马树洪:《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老挝经济的影响及其走势》,《东南亚》1998年第2期。

②贾康:《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③张恩迅,申玲玲:《中国新移民跨国实践的特征研究——以老挝的湖南人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④Huntington S P.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文化适应特征。

总之,老挝湘籍农村人口出现“流而不迁”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老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明显,湖南人更改国籍的实质意义不大;二是老挝主流社会可提供给湖南人的社会资本有限,尤其是教育、医疗等资源匮乏;三是湖南人在老挝寓居时间有限且文化差异较大,湖南人多地少与老挝人少地多的环境差异,导致湖南人难以认同

和理解老挝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四是湖南人在老挝建立了遍及城乡的商业体系和经济聚居区,他们在聚居区的日常生活、经营、交际、娱乐等均能得到满足;五是便利的交通、通讯、互联网工具等进一步强化了湖南人与祖籍地社会的跨国联系,强化了他们在老挝的族群边界;六是来自祖籍国政府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跨国支持与影响。

Weak Inte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endulum: on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Hunan Rural Population in Laos

ZHANG En-x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9, the Hunan rural populations, who moved to Laos to do business and wor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pendulum” and “weak integr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acculturation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y the previous theorie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paper gives up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town economy,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hinese policy, discusses the reasons why Hunan rural populations “flow without dwelling”.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transnational pendulum; south-south mobility

(责任校对 莫秀珍)